

立即

邹韬奋传记

● ●
马仲扬
苏克尘
著

重庆出版社

邹韬奋传记

马仲扬
苏克尘 著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封面题字 李书敏
责任编辑 李书敏 陈兴芜
封面设计 李书敏 邵大维
技术设计 忠 凤

马仲扬 苏克尘 著

邹韬奋传记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 插页 11 字数 467 千
1997年9月第一版 1997年9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66-3646-6/K·189

定价:33.50 元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韬奋离上海
赴汉口，途经长沙时留影。



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作者合影(1992年春)。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
 鄧拓同志的精神，这就是
 他之所以感动我们的地方。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为悼念鄧奋
逝世的题词。

鄧拓奮鬥五十年
 路是中國知識分子
 向進步生的革命道路
 紀念鄧奮鬥五十年
 周世榮

周恩来为纪念鄧奋
逝世 5 周年的题词。

韜奮同志
愛國志士
民主先鋒
朱德

朱德为悼念韬奋逝世的
的题词。

韜奮同志舍己
為公用他的一枝
筆為革命利益奮
斗一生的精神永
遠活在人們心里

宋庆龄为纪念韬奋
逝世 35 周年题词。

宋庆龄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四日



1. 韬奋的父亲邹庸倩。
2. 韬奋的母亲查氏, 浙江海宁人。
3. 韬奋 13 岁 (1908 年)。

$$\begin{array}{r|l} 2 & 1 \\ \hline 3 & \end{array}$$



韜奮全家合影(左起:长子嘉骅、夫人沈粹缜、韜奮、前排幼女嘉驪、次子嘉驺)。



韜奮和夫人沈粹缜(1926年)。



1928年韜奮和夫人沈粹缜及长子嘉骅合影。

1935年8月，韬奋离开旧金山回到上海。到码头迎接的有张仲实(左一)、李公朴(左二)、艾寒松(左三)、沈粹缜(左五)等人。



韬奋出国，胡愈之(右三)、徐伯昕(左一)、沈粹缜(右一)等至码头送行。

力爭救國無窮不是為個人是為救
亡途劫前途不許侮辱人格也不
為個人是為中華民族人格的光輝

韜奮
三十五年六月廿六日
於南京看守所

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题词之五。



1935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韬奋被选为执行委员。韬奋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图为他在会上发言。

韬奋等 7 人出
狱后与战友杜重远
会见爱国老人马相
伯。



韬奋和他的
“难友”在狱中锻炼
身体。

“爱国七君子”出狱后合影。





在重庆工作时的韬奋。



韬奋从国外回到上海，眼看国事危殆，立即以新的战斗姿态，经短期筹备，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创刊号。



1938年9月中旬，韬奋和沈钧儒、范长江、王炳南等由武汉出发，到江西德安一带慰问前方抗日战士（自左至右：王炳南、韬奋、薛岳、沈钧儒等）。



韬奋特别重视读者来信，接编《生活》周刊后，便设立“信箱”专栏，帮助读者解答有关生活、求学、职业、婚姻、医药等各种问题。

纪念邹韬奋诞辰 100 周年(代序言)

胡 绳

邹韬奋同志是在本世纪 30 年代的激荡风云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革命知识分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中,30 年代是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国民党在 30 年代开始的三年前,背叛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革命而取得国家政权。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寄希望于这个政权,以为它可能带给中国以不同于北洋军阀时期的好的局面,但是事实迅速地表明,这种希望完全落了空。国民党当权以后,内部为争权夺利而派系林立,互相倾轧,甚至酿成规模巨大的内战。国民党政权无力造成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因此它也不能使国民经济有较明显的进步和发展。中国贫穷落后,一切如旧。对外,国民党政权也不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有丝毫改变。在进入 30 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公然攫取中国的东北,并且进逼华北。对于外来的武力侵略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国民党统治者采取逆来顺受的态度,实行所谓不抵抗政策。

中国共产党在 30 年代开始时,就其整体说,政治上还不成熟。它所实行的革命原则虽然是对的,但有些做法是错误的,“左”倾的指导思想使它继续走了几年弯路。经过 1934、1935 年的长征以后,中国共产党重新站稳脚跟,实行符合于中国情况的一系列政策。它的力量虽然还很小,处境很艰难,但是它的政治影响不断地扩大。

邹韬奋生于 1895 年,在上海受过直至大学的正规教育,然后在上海的工商机关和教育机关中过工薪生活。他在青年时期似乎

很少受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时，他在主持办《生活》周刊。当时《生活》周刊的内容主要是谈个人的修养问题，和读者进行生活、家庭、职业等方面问题的讨论。他的刊物很少谈政治，在谈到政治时也无非是要求“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当时韬奋还说，“中国目前所急需的有三件东西，一是统一，二是生产，三是国防”，这话其实是要求国民党政权做到作为一个国家政权最低限度所应该做到的事情。当时问题其实是，国民党政权为什么做不到这些最低限度应当做到的事？怎样做才能实现这些事？对这些问题在当时韬奋的看法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国民党取得政权后的所做所为，已经证明它是中国进步发展的障碍，如同在它以前的北洋军阀政府一样。但是在这时候，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去扫除这个政权，那恰好给正在以全力准备并吞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有利的机会。当时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把民族的矛盾放在第一位，把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问题摆在第一位，在这个前提下，团结全国一切力量共同反抗侵略者，也推动国民党统治者参加抵抗侵略的斗争。这样不但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而且可以有希望通过救亡推进全民族的进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以后，就逐步地坚决地转移到这样的政策上来。这种政策的实施，受到各方面人士的欢迎，也对于国民党政权形成重大的压力。

经过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后，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逐渐地增加了议论政治的篇幅。他以朴素的语调、说法，说了一个爱国主义者在这时的所感所想。他揭发国家的危机，分析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妥协让步。他的言论很明显的是不符合国民党当局的要求，而为广大人民所赞成的。韬奋的特点在于，他明知有政治的风险，但绝不掩饰他觉得应该讲的话。他在言论中坚决表示，要救亡图存，不能依靠国民党当局，而要依靠人民大众的力量。在1933年，他被列名在国民

党的黑名单中，他的刊物被封闭，他被迫流亡国外。这时他并没有进行过什么政治活动，只是曾参加宋庆龄先生发起的民权保障大同盟。他有个别的朋友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他开始去了解共产党的主义、主张和它所进行的斗争。韬奋靠自己的稿费在国外旅游两年，于1935年回国。这时正是日本侵略势力一步步深入华北的时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时候。韬奋没有因来自国民党统治势力的压力而退却，他继续经营进步的出版事业，同时参加群众救国运动。他所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以更加鲜明的态度，在群众中倡导抗日救国运动。在这刊物的第14期上，发表了韬奋的一个《启事》，他说，“近来得各方读者友好来信，报告本刊将被封闭和我将被拘捕和陷害的消息”，为了“也许变起仓促来不及留下几句话和许多读者好友道别而遽去”，所以发表这一启事。《启事》中他庄严地声明说：“我深信只有大众有伟大的力量，只有始终忠实于大众的工作，才有真正的远大效果，我个人无论如何必始终坚决保持这个信仰，决不投降于任何和大众势不两立的反动势力。”又过了半个月，这个刊物终于在第16期上宣布被迫停刊。他又发表《启事》说：“我个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个分子所应负起的责任，我决不消极，决不抛弃责任，虽千磨万折，历尽艰辛，还是要尽我的心力，和全国大众向着抗敌救亡的大目标继续迈进。”也就在这时，韬奋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这个党在中国政治上的作用和地位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开始把中国的前途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在中国共产党出现于中国政坛以后，除了有许多先进分子参加党以外，总是有许多党外的同情者。他们虽然不是出身于劳动阶级，也不是，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同情共产党所从事的事业和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以各种形式帮助共产党，他们可以说是党的同路人。在1927年的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把它的主要力量用在农村。这时党在城市中的力量，包括它的

同情者的数量，都显著地减少了。直到 30 年代中期，在国民党地区内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党正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述情况有了改变。党的中心虽然是在中国的西北角落里，但是它在全国城市中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同情它的事业和实际上支持它的主张的人数大大地增加了。韬奋在这时成为党的积极的同路人，有重要的意义，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他多年间以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办刊物，由于他在言论中表现出来的一片爱国赤诚，由于他坚守真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他受到广大读者的爱戴。他的杂志最多时销售量达到 20 几万份这样一个在中国出版界中空前的数字。他对政治方向的选择，影响了数以万计的群众。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终于收到了实效。由于共产党坚持这个方针，由于全国爱国救亡运动的推动，再加上国民党统治者从维护自己的统治权出发而进行的利害得失的盘算，国民党承认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原则。1937 年 7 月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但这时韬奋和沈钧儒等在上海的 7 个救国运动的领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拘禁在监狱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才被释放。

在抗日战争期间，韬奋的社会地位、社会声望很高，被国民党政府聘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在国民党地区内继续从事出版事业。由于他支持共产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反对国民党实行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他和他所办的杂志、出版社成为国民党统治者的眼中钉。在 1939 年到 1940 年间，他所主持的生活书店分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的 50 多个分支店，先后被封闭。1941 年在发生“皖南事变”，整个政治形势恶化的时候，共产党组织为保护韬奋，安排他离开重庆到香港工作。1941 年 12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香港。由于国民党政府已命令它的特务系统搜索韬奋的行踪，在任何地方捉到他时“就地惩办”，所以韬奋不可能再回到

内地的国民党地区。共产党组织帮助韬奋辗转到达共产党领导的苏北抗日根据地。但这时已发现他患脑癌。在艰苦的农村根据地无法进行治疗，只好把他送到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所统治的上海，秘密居住在那里，治疗无效，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 1944 年，他在上海逝世。他的遗嘱中充满着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他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的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的祖国与人民继续奋斗。”他要求参加共产党，在遗嘱中说：“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认为合格，请追认入党。”这个伟大的爱国者把加入共产党作为他一生历史的总结。

在 30 年代以爱国救亡为主旋律的激荡风云中，出现了一大批经过独立思考，把政治选择放在共产党方面来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们本来都对社会做过有益的贡献，他们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不是共产党的同路人，但国民党使他们失望，他们根据客观事实和自身的经历，终于确定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社会上还有众多的受他们影响的人，也随之而倾向于这种政治选择。邹韬奋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的胜利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抗日战争结束时，还没有能确定中国今后的命运。经过一些曲折，终于爆发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大决战。共产党在这场大决战中取得 1949 年的彻底胜利，并不是因为它的军事力量强过国民党（相反，它的武装力量在战争开始时比国民党小得多），而是因为民心不在国民党方面，民心在共产党方面。为什么广大民心背离掌握着政权的国民党，而趋向力量相对弱小的共产党？追溯历史原因，就应当看到 30 年代。在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处境还十分艰难的时候，韬奋和其他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就愿意与共产党同甘苦，共命运，就把中国的前途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正确选择不但对当时的人民群众起着一定的影响，而且对以后多